



编者按：为深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更新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推动法学理论、涉外法治研究和“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于2023年7月3日—7日联合举办第四届“法意”暑期学校，主题为“帝国、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新视野”。

这次暑期班是法学内部的“帝国研究转向”^①与“区域国别学”的兴起相互结合的产物。自2018年起，北京大学的法学学者即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的支持下，组织面向全国研究生的“法意”暑期学校，探讨近代以来的新旧殖民帝国究竟如何运用各种法律技术以及与之配套的理论和叙事建立起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而思考如何将克服依附性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世界历史意义进一步理论化。2022年，“区域国别学”上升为一级学科，而这是一个内在要求打破传统学科界限的前沿交叉学科。20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从一开始就不只关注将特定的区域或国家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更关心如何在此之上形成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而“帝国”正是一个有助于建构整体性视野的学术议题。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这次暑期班意味着法学与新生的“区域国别学”的深度结合与协同发展。

在经历四天半的课程学习之后，7月7日下午，在暑期班结业圆桌研讨会上，来自法学、历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等多个学科背景的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帝国与国际法（或国际体系）在全球历史中的相互关系，并思考对这一相互关系的探索将如何促进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知识生产的主体性问题，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塑造何种形态的“自主知识体系”。组织者与《东方学刊》合作，对与会学者的演讲进行了全文记录和整理，以飨读者。（章永乐）

^① 关于法学的“帝国研究转向”，参见章永乐：《“帝国研究转向”与法学研究的中国道路自觉》，《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帝国、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新视野

殷之光 李诚予 王献华 章永乐 王维佳
吴义龙 雷少华 傅 正 陈晓航 宋念申 强世功

殷之光：主体性的发现

作为一个连续四年参与暑期班的“老教师”，我每次来都能感受到不同的启发与激励。这是由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集合了一群具有共同问题意识的同仁，从诸多不同角度进行教学相长的研讨而产生的结果。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个行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去年刚刚回国时，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我说，在海外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始终有一种做客卿的感觉。我想，这种感受恰就说明了我们在课上曾经提到过的一个命题，即人是在时间与空间中游走的生命。我们对世界的思考，对自我的认识，都无法脱离时空维度而独立存在。也正是在这个命题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思考章永乐老师提出的“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问题”才有意义。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有疑问。知识难道不是客观、普遍、足以穿透时间与空间屏障的吗？在这里，我们面对着一种由观念带来的迷障。客观与普遍并不能等同于永恒。当我们把时间与空间维度纳入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中之后，便能发现在这两个维度的纠缠、重构、革新中，一个动态的、多样的、丰富的世界才真正得以不断形成。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一方面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进行自我塑造，另一方面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着这个变动的世界。

在承认了上述条件后，我们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才有意义。主体性的出现并非对他者的拒斥，而是在与世界不断互动中的自我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往复的历史进程。在过去较长时间里，我们始终安心于用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语言来描述自我，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这套理论语言是抽离时空、亘古不变的真理。这种理论的迟钝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且与近百年来西方自由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及其相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密切相连。今天，我们对社会、政治、历史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进行批判与反思，以及对中国的发现，并非要用一种中心主义取代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是希望恢复理论真正的活力，还原理论本身对多样的、动态的世界进行描述与抽象的能力。这个工作则需要将理论重新放进时空的维度中，发现其普遍性追求，也亮明其局限。只有在这样的对话中，理论才得以向未来推进。

重新回到开头我提到的，为什么要回国的问题。对主体性的发现也是时间性的。它应当被视为一个动态的进程。15年前，我也像在座的许多老师一样，向西而行，试图在西方的知识中寻找到自己。许多年之后再次回望，我才意识到，这个向西的旅程本身远比我原初构想的向西的目标重要得多。在这个10多年的旅程中，我目睹了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也目睹了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社会的低迷与彷徨，更目睹了中国国力的变迁以及在这个进程中遭受的种种无端指责。也恰是在这个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我们大多数人参与讨论并挑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西方的





理论霸权，寻找理论的主体性，才得以成为可能。

这种对理论主体性的发现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性的。我刚才提到，对既有普遍性叙述中西方中心主义问题的发现与批判，并非对普遍性本身的否定。恰恰相反，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就是要将普遍性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叙事中拯救出来。这需要我们将视野打开，将人类不同时空中对普遍性问题的思考都纳入讨论范畴之内。这也不是要简单地通过罗列的方式展现多样性，而是需要在人类整体性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动态地、语境化地理解多种普遍主义话语的此消彼长、相互纠缠，并在这个复杂的关系中，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构成。区域国别研究很多时候的确是对他者的深描，体现这种深描“客观性”的重要方式需要隐去我们作为观察者的主体存在。然而，当我们假装成一个超然世外的旁观者时，我们恰恰也不知不觉地迷失了自己。在这种伪装的超然中，我们或者不自觉地将自己幻想为被观察者的一分子，与研究对象产生了共情，产生了研究一国爱一国的现象；或者居高临下，站在由某种普遍主义话语支撑的“客观”立场上，对被观察者做出臧否。无论如何，这种为了体现“客观性”而刻意隐去的观察者主体，往往成为消解客观性的根本原因。

对主体性的发现与承认，则可能是走出这种困惑的途径之一。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提到了所谓“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在这本书中，萨义德时刻提醒着读者们自己的身份。在写作中，萨义德时而用“我们”，时而用“你们”，也会用“他们”来指称巴勒斯坦人。随着这种代词的转换，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观察者萨义德、作为读者的我们，以及被观察者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现实存在的距离，感觉到了作为美国学者的萨义德和作为巴勒斯坦人的萨义德在走进巴勒斯坦社会这个现实之后，两种自我间的游移与交错。这种“双重视角”坦然地将萨义德作为一名“参与的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将他自身的观察与思考，将他个体多种社会身份之间的游移与交错变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正是不掩饰“双重视角”的萨义德才能将封闭、完结的文本重新打开，并将其融入开放世界之中，成为这个世界有生命的片段。作为作者，也正是在这种不掩饰的文字里，才能诚恳地邀请读者，参与到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复杂旅程之中。萨义德主体位置的认识与自觉，无法简单地用对巴勒斯坦“身份”的“认同”来概括，而更应当被视作对单一身份定见的主动突破。

今天，我们对主体性的发现与承认，一定程度上与萨义德文本中观察者的现身发生着共鸣。我们今天的区域研究既不是为了成为被观察者，也不是试图将某种理想的形态强加于被观察者身上；我们是要在这个观察的关系中，不断认识并反思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介入这个世界的塑造。作为在时间与空间中生存的生命，我们也正是在这个不断地探寻与对话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立场及我们的使命。我们从来不是面向历史的终结而生，我们是历史不断前进的组成部分。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李诚予：文明标准中的边境要素

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在中国古典法理学。以传统经学观之，古代中国无世界之认识，但有天下之概念，并以文明次第划分华夷，其标准与近现代国际法秩序存在形式上的近似，质言之，





皆着眼于文明秩序。华夷之别可分两个层次看待。其一，以民族和地域为尺度，由九州五服的政治哲学转化为中国、诸夏和夷狄之别，从而在地理上成就中央与边疆的关系。其二，划分华夷根本上不是地理问题，而是文明标准问题。达不到标准，诸夏可退为夷狄；达到了标准，夷狄则可进为华夏。所以，在公羊家的“三世”说中，当人类社会进展到“太平世”，“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文明以止，天下大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树立起来的文明标准与此存在实质差异。

以英国第二帝国为代表，欧洲殖民主义最初带有一种宗教式的使命感，以为自己的天职是要将先进的文化输出到那些愚昧、落后的社会，以成教化之功。这套高度道德化、正当化的理论遭遇挫败之后，经过亨利·梅因（Henry Maine）等人的反思，转而承认原住民社会的自身价值，开始在自然需求和原始情感上缔造认同政治的底层逻辑。然而，无论哪个版本的文明观念，既摆脱不了等级秩序的结构意识，也绝不肯承认这种秩序有可能发生颠转。因而，不变的是背后那套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晚清以来对现代及现代性的讨论也很难摆脱这种文明次第的阴影。诚如章永乐老师在课上提到的东亚宪法焦虑。我们为什么要有宪法？因为它是现代国家的标志，有了它就有可能在和西方列强谈判时平起平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仍然需要对现代与现代性进行持续批判。现时代的文明标准是什么？争论恐怕永无终止。方向在哪里？殷之光老师或许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基于全球南方的国际主义必须成为思考的前提。“厚”的共同体一定会到来，永远在到来。

当然，应该看到，这是政治哲学层面的论证，不能取代现实政治斗争。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王献华老师在讨论阿卡德帝国时，强调两河流域城市国家的历史连续性必须建立在“文明理由”之上，跨越受外在条件制约的“不确定地带”，才有可能走向繁荣昌盛。或许是基于相似的认识，强世功老师提出，我们需要将边疆理解为不同文明相互冲突的地带，反过来，也必须在跨文明的视野中思考边疆。这里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一种历史的能动性，以及挖掘、激发这种能动性的方式。宋念申老师的课让我感到东北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的典型性。什么是东北亚？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在这些基础问题上其实也存在很深的争论。地理学认为，东北亚是中国东北部、日、朝、韩，加上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基于区域经济研究，这个范围则可以将俄罗斯、中国全境、蒙古国、朝鲜半岛、日本全部纳入东北亚。因此，任何一个学术选择都应基于历史能动性的考量。我们的暑期学校叫作“帝国、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新视野”，该标题就包含着这个基础问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即帝国、国际法、区域国别三者的相互界定关系。正如宋念申老师的研究，将“无人地带”概念置于19—20世纪国际法理论进行知识考古学的观察，各国权力的交叉、缠斗使最初一个地理勘察官员的无心之失，进展为新老帝国冲突叠加的焦点。边疆还是那个边疆，也不再是那个边疆，它以几乎全新的方式完成了重新界定，成为我们当今讨论技术高边疆、金融新边疆等问题的知识先驱。王维佳老师对世界传媒体系的建立与变迁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具体研究的一个榜样，也让我反思自己在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

例如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蒙古的全民投票并没有，也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问题，反而加剧了中国境内问题。传统的解释是基于冷战背景的，而冷战研究又总是将大国对抗视为问题焦点。但如果换个角度，像强世功老师所提示





的那样，将边疆视为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将主要国际力量在该时期的对华政策视为中国解决边疆问题的一个条件，视为不同文明在前线地带的冲撞，就很可能得出不太一样的认识。这里面有个主体性转换的问题，这似乎是个很大的问题，但答案可以来自一种常识性的反思。比如说为什么在法学院研究自然法是正当的，而研究传统经学就是怪异的？是否可以把研究自然法当成研究经学的一个条件？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总之，本次暑期学校对我个人来说形成了强烈的智识刺激，相信各位学员也得到了很多收获。最后，请允许我用奥登（Wystan Hugh Auden）在 1939 年写下的几行诗结束我的发言：

明天属于年轻人，诗人们会像炸弹般冲动，
湖畔的漫步，数星期的融洽交流；
明天会有自行车比赛，在夏日黄昏穿行于郊外。
但今天只有斗争。^①

（作者系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王献华：文明史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感

我年轻时候听过一句话，叫作“浑不知今夕何夕，又怎能一生嬉戏”。从我的角度理解，首先就是我们现在在什么时候？往大了说是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之中，在我们看到复兴的时候，危中有机，机中有危，人类一再证明不能用侥幸得到复兴。这个语境之下，我想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有自己的责任感，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感。我们本来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太一样的位置。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打击别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们的使命，民族的使命，个人的使命。

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概念，有它的意义，因为正道还是不那么正道，这是关乎整个人类未来的问题。在这个语境之下，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每个人能做的不一样，在这里我想起我和章永乐老师共同的朋友，对我来说意义非常不一般。他跟人纯粹聊学术问题，可以聊一通宵，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非常经常的事情。我们共同的朋友刘海波老师，他 11 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有一个说法，叫“自成体系，自建光荣”。这是一种真正有主体性、有勇气的追求。作为研究者，我想在学术上可以把定位定到这里——自成体系，自建光荣。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来回答如何？我们可以回答得更好。

有主体性意味着一种做法，一种标准。我本科是历史系，硕士到博士先在宗教系，后来学楔形文字这种比较偏的东西，但是有一点我从来没有忘掉，我学这些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给出过高屋建瓴的答案，他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都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②。我从自己的经验来讲，也觉得不管大家学什么专业，对历史的重视作为知识基础的培育是很重要的。没有足够的考古和

^①《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9—300 页。

^②《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载《人民日报》2015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载《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11 页。





语文知识，只是道听途说地去空谈理论，这个是不行的。我倾向于在自己研究世界的基础之上观察、思考我们关心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抽象和理论化的正确方式。

另外，大家看到我的工作单位叫全球文明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我们自己建的，几年前才在外建立。我们本来准备叫全球通史研究所，为什么？基于一个感想。当时就我对全球史的了解来说，我觉得欧美的全球史其实是不通的。

有一个小故事：写19世纪世界演变的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号称21世纪的布罗代尔，说是默克尔有一年过生日，专门邀请他参加生日派对，这成为全球史取得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例。现在默克尔不当总理没有那么忙，但过生日肯定已经不会再请奥斯特哈默。我们用全球文明史努力发展我们的思路，只是要讲的内容就太多了。

老师们中，傅正老师做现当代，我是做非常老的时代，但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宋念申老师也提到全球史一方面反对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塑造一些东西，这一点我特别有同感。我的理解，简单来说，全球史这个概念我们没必要丢，全球史肯定都会讲自己的主体性，那就各自写自己的全球史，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中，到底谁真谁假，谁通谁不通自然也就出来了。我觉得我们写的全球史会更有说服力，比德国人的全球史、美国人的全球史更靠谱。回到操作的层面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规范性地说全球史该怎么做，只是要做得更好，更有说服力。区域国别研究大概也是一样的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章永乐：从玄奘法师的“西途东归”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非常感谢王献华老师提到我们的亡友刘海波老师的“自成体系，自建光荣”这八个字。这是刘海波著述中最打动我的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在今天正在推进的事业，从产业经济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到学界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最近的数十年，中国取得了许多前无古人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并没有带来成比例的自豪感。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适用的“光荣”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设定的，而且这不仅是一套政治标准，更有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来论证什么才是“光荣”。我们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就会活得充满歉意，喜欢自我反思，老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就是不掌握“光荣”的评价权所带来的结果。中国的战略决策层走在学界的前面，提出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呼吁，这从根本上就是“自建光荣”的呼吁。

但怎么建构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呢？我在这里就想到了玄奘法师，《西游记》里面的唐僧。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前往天竺取经，在那烂陀寺等地精修佛法十余年，学成之后，代表戒日王朝君主信奉的大乘佛教，参加在曲女城举办的法会，与代表其他教派的天竺高僧辩论，大获全胜。玄奘法师载誉东归后，十九年内翻译经论达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翻译强调译文的忠实、精准，成为佛典翻译史上的一大分水岭。而玄奘法师奉唐太宗之命口述成文的《大唐西域记》，可谓法师学术工作之外的“智库”研究成果，获得了唐太宗亲笔批示，为唐初中央政府处理西域军政事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西游记》只写了唐僧西天取经，没有写唐僧写《大唐西域记》，我想这跟明朝未能像汉唐那样控制西域，明朝的讲述者和编辑者跟西域存在较大心理距离感有关。





今天在座有一半老师是在国外拿的博士学位，完全可以说，玄奘法师是我们这些留学生的典范。但是玄奘法师有没有局限性呢？玄奘法师在“东归”后展开的另一项工作，是按照佛教原典的精神，力传法相宗（亦称“唯识宗”），其教义反对“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立场，而且理论复杂烦琐。法相宗教数传而衰，在中国本土最终胜出的，实际上是主张“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佛教教派。任继愈先生评论指出，法相宗教衰落的原因在于“这一宗派不适合中国的需要”。玄奘法师将一系列佛教经典翻译为汉语，这只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但在这一方向上，他并没有走多远。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我们本土的知识体系中扎得更深，可谓中国古代“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不仅对大唐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更是成为那些疏于记录历史的南亚国家考古发掘和历史叙事重建工作的重要指南。

打个比方，玄奘法师就好像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一方面，把美国某个领域中最为经典的一批文献翻译过来了，而且忠实地传播他的老师的主张，但这些主张在中国后继乏人；另一方面，他写了一本关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的随笔集，火了，不仅有国家领导人批示，而且我们普通读者也爱看。《大唐西域记》火了，不是法师刻意的，他提供了当时的中国本土社会想要的东西，但他自己并没有下大功夫琢磨中国本土社会到底需要什么。他如果真在这方面下功夫，应该会仔细思考忠实传播他的老师的佛学教导是否会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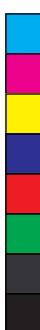
在今天，当我们面临“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时候，怎么看待玄奘法师，其实也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处理和自己的留学经历的关系。我的主张是，要有“西途东归”的自觉。我们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进行博士论文选题，按照那个知识体系的要求展开论证，最后也按照那个知识体系的评价标准拿到学位。我们受到的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是非常宝贵的。然而，研究议题的设置的确会存在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问题。我们穿越了不同的知识体系，而这使得我们可以做一件工作，那就是面对当代中国“自建光荣”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知识体系的那些要素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是根据什么样的结构性原则被组织到一个体系里的，简单来说，就是研究这个体系是怎么被“做出来”的。相应地，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主体性，对流传到我们手中的人类文明的思想与知识遗产，进行新的组合，形成我们自身的体系。

做这样的工作，在现在的学术体制下，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你不是根据成熟的范式来写文章，你做的工作甚至会被一些严守“家法”的学界前辈认为是不尊重他们。无论是在发表、职称晋升还是人才帽子的评定中，遵循别人已经走出来的路，总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自建光荣”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时代使命，面对这个使命，我们最终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聘副教授）

王维佳：帝国史中的信息传播问题

我们这个暑期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帝国”，在中国知识界，这是一个近来很火热的概念，确实也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和政治辨析空间；另一个关键概念是“区域国别研究”，这是一个在政策变动背景下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在官方体制中上升到一级学科地位的概念。然而在知识讨论中，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的议题并不太多。这可能是北大暑期班一个很明显的特色。从社会科学和国家政策需求互动的角度来看，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领域近





年来非常受重视。“区域国别”“国家安全”都已经成为一级学科，我们新闻传播领域的“国际传播”也正在争取获得同样的地位。然而在这些研究领域内部，真正能够做到历史贯通性的讨论非常有限，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多数研究停留在事实信息的介绍上，鲜有深入的历史性、政治性思考。

从我个人学习和研究的心得角度，“传播”和“帝国”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带来了很大启发，这是在与各位老师不断进行跨学科交流的过程中获得的收获。

一方面，对帝国的讨论带给信息传播问题一个基于历史结构变动的整体视角；另一方面，信息传播问题也为理解帝国和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和思考路径。例如，大家都知道当前的全球自由经济遇到很大问题，全球化遇到很大阻力，其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信息传播的问题，而在信息产业领域，在网络控制领域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今天全球性的关键问题。那么对信息传播产业和全球网络中权力与制衡的研究，就会成为我们理解当前全球化困境的一个现实抓手。

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传播是一个操作性地理解帝国问题、理解全球权力结构问题的绝佳途径。这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具体研究的问题，例如，不同的群体之间怎样连接，如何构成网络，按照什么规则相互交流，等等。

与此同时，通过信息传播网络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区分帝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different 形态，更具象也更深入地理解人类历史的阶段性变化。

举例来说，15—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欧洲思想历程和帝国历史中是一场颠覆性的“空间革命”。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一空间革命的核心就是重新发现“海洋”这种新媒介，并且发掘了它连接全球的特性。相比陆地，海洋是地理与人文的真空地带，一个天然的垄断通道，具有陆上传播不可比拟的效率优势、成本优势和安全优势。从征服、占取和垄断的角度来看海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单一性：这是一张不用转换技术标准、不必缴纳高额关税、不需支付维护费用、不受属地政治环境影响的、四通八达的巨型网络。如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言，当欧洲人发现海洋联通全球这一地理事实之后，他们“第一次像把一个球体攥在手里一样了解了这个地球的实景和全貌”^①，全球传播体系也由此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那时开始，欧洲人不再只用点对点连接的方式来看待跨地域传播，而是获得了一种普遍联通的网络思维和一幅全球性的战略地图。在这个意义上，“空间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媒介革命”。从此以后，海洋不再被认为是各种文明分享与互鉴的中间地带，不再是一个交通线路上彼此搭界、不断接力的无限空间，而成为一个有限的、闭合的、可以在理念上瓜分和控制的战略区域。从教皇子午线和《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年代开始，寻求对全球通商与通信网络的独占或瓜分就成为西方殖民力量的首要目标。对海洋航线的垄断启发了帝国主义者，教会他们如何对待此后的每一种全球性媒介——通信电缆、无线电、新闻通讯社、通信卫星、因特网，与现代媒介技术演进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寻求用单一力量或者寡头协商的方式来控制国际传播体系的野心和偏执。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现代帝国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开端。它跟古代帝国领土扩张的方式不同，是一个自上而下有设计、有规划的过程。在没有力量支配，甚至没有力量到达一处的时候，现

^① [德] 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 页。





代帝国就已经在理念上划分和占取了这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理念都是在一种媒介的创新和突变过程当中产生的。

从这个海洋性媒介的历史起点开始，出现了一种理解全球网络的帝国思维，其关键一点就是维系网络体系的单一性。今天之所以有中美战略博弈中围绕信息科技变化、围绕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的争执，正是帝国对全球网络单一体系控制能力逐渐弱化而产生的应激反应。从海洋时代开始，从对航路的控制，到后面对铁路交通的控制，对信息通信系统的控制，再到对赛博空间的控制，都可以在这一思路上建立分析的基础。这里面涉及的国际法规（比如，多边协调机制还是利益相关方的机制等）不仅是传播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领域的热点问题。

另外，网络连接问题的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还与它所连带的非常庞大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工程技术有关。所有网络体系，从铁路到电信，所涉及的钢铁、稀有金属、橡胶、铜矿等都是国际大宗投资和大宗贸易的重点领域。这些资源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欧洲意义上的“新世界”，因此考验着帝国的资源调配能力和人力调配能力。由此可见网络建设对于帝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举例来说，大英帝国在非洲修建铁路时，不仅可以将工程技术人员和大批物资调配到印度洋西岸，而且可以从旁遮普调配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农民去做劳动力；美国和加拿大在修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铁路时，也要大规模地调配中国苦力。网络基建的能力体现着帝国的全球控制能力，也体现着帝国运行的基本方式和规则。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扩张和控制，离不开国家暴力机器与资本创新能力之间的巧妙配合。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最早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国家就在不间断的战争中形成了军事强制力与资本创新力之间的紧密关系。伊丽莎白女王与海盗群体之间的合作、伊比利亚国家与热那亚航海家之间的合作都是典型。到中世纪晚期，绝对主义国家逐渐崛起，战争和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军事能力开始集中于王权，金融资本开始介入战争生意，国家财政与军事科技研发、生产密切结合，逐渐形成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原型。由于超级金融体系和庞大军事工业的兴起，垄断资本的能力逐渐膨胀并不断在全球各地寻找新的创新和独占的空间，由此，宗教传播的热情、帝国扩张的野望、资本扩张的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国际传播体系加以垄断控制的强大动力。这种战争机器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在当代世界发生多少改变。美国宇航局与马斯克之间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星链网络系统可以说是一个最新例证。

帝国的存在并不仅仅以“实力”作为基础，还包括很重要的合法性确认过程，也就是它的文化传播过程，也是帝国跟传播之间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塑造不是简单地基于国家形象和帝国形象，而是通过对知识体系的创设，去传播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认识世界的规则。例如，以历史哲学面目出现的文明等级论、以客观进化面目出现的现代化理论等，都试图讲述现代世界构成的普遍性方式。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帝国传播问题，是一个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生产共识和文化霸权的过程，是帝国合法性生成的过程。

以上所列举的一些角度，都是我觉得从帝国与传播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全球历史、国际法规的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也做一个邀请，欢迎各个学科的年轻学者加入全球传播历史与国际传播问题的研究当中，共同为理解帝国、理解世界找到一些新的灵感和新的路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聘副教授）





吴义龙：政法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互动

我对于帝国、国际法和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和领域，并不是太精通。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苏力老师在2001年关于中国法学研究流派有一个划分，大致有三个流派：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①今天的议题，如果从法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属于政法法学，而我的研究方向是社科法学。

政法法学与社科法学之间有共同点，都强调交叉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但两者之间也有不同点。这也正好给了我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以社科法学阵营的视角来看政法法学，看看对我们以及对整个法学研究会有什么样的启发。两天前，章永乐老师给我发了一篇他最近新写的书评，就是关于强世功教授最新著作《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以下简称“《文明》”）的书评，^②借助这个书评及其他相关文献，我简单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政法法学的研究视角给了我两点很大的启发，第一个启发是强调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其实，我们社科法学也是有批判、有反思的。比如说，我们社科法学对于传统的中国主流的法治话语也有反思。但是，就此而言，政法法学不仅有批判和反思，甚至更加往前推进了一步：不仅是反思和批判有关法治的话语，甚至对于法治本身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通过不少重要术语予以重新界定，同时也大大扩展了我们的分析框架。

比如说，阅读了章永乐老师的这篇书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帝国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方法。这和我以前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我以前理解帝国，总是把帝国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帝国其实跟主权、民族国家紧密相关。大家知道，国际法上的政治主体（或实体）通常就是主权国家或者民族国家。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主权、民族国家其实以帝国作为背景、以全球化作为背景，是全球化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主权国家其实是一个例外，是一个新鲜事物，而常态则是帝国。^③这一点是我之前所不知道的。

此外，《文明》对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而这个界定本身则是由问题意识驱动的。当我们遇到问题，尤其是新问题，援用既有的一些理论、概念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解释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先停一停，反思我们的概念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不是有问题。我们说，一个问题的产生，其实意味着这个问题原有的语境发生了某种改变，这将促使我们反思原有的理论和概念是否能应用于新的语境，是不是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界定。这个对我有特别大的启发。

第二个启发是，政法法学的研究视野特别宏大，因为社科法学研究法律，重点研究的都是一个比较具体细微的对象。研究具体、细微的东西，如果忽视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语境或者背景，其实很容易看错或者看偏研究对象。比如说，我们重新构建全球新的法秩序时，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政治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文明秩序，其实看不透，或者看偏了所谓的“法秩序的构建”。正

^①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强世功：《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三联书店（香港）2021年版；章永乐：《从“法律多元”到“世界帝国”》，未刊稿。

^③ 在另一篇文章中，章永乐指出，《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最具学术范式意义的论断是，以“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范式来理解当代世界是完全不够的。参见章永乐：《“帝国研究转向”与法学研究的中国道路自觉》，《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如强世功教授所言，“需要围绕帝国、文明与国际法等全球法秩序建构问题展开讨论，在更为一般的理论意义上思考法秩序的建构。”^①从这个方面来说，政法法学的研究视野很宏大。这里的一个重要启发是，当我们研究法律或法学院问题的时候，不仅要了解这个具体问题本身的语境，而且要引入全球视野、帝国视野和文明视野。

说到“文明”，强世功教授认为，在“文明”这一概念中，“文”与“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也就是说，通过“明”不断推动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从而不断摧毁、重建已确立的“文”。^②另外，章永乐老师在书评中提到，“世界帝国”的兴起所带来的“古今之变”，关键就是“文明”中的“明”压倒了“文”，乃至重新定义了“文”。^③因此，如果我们按照强世功教授的说法，将“明”界定为认知能力，而将“文”界定为文化观念，^④那么，在不同时代，这两波力量的对比是有差异的：在早期，可能是“文”压住了“明”；而对于现在来说，则是“明”压住了“文”。但在未来，“文”与“明”之间关系将会是怎样的？我们要如何在这两种价值之间做出选择呢？

社科法学有很多不足，政法法学对其有批评。在这里，我会为社科法学做一点小辩护。在不同价值间如何选择，社科法学其实可以和政法法学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我们传统关于价值、意义的讨论，它会有一个相当致命的不足。这就是：当两种不同价值和利益产生了对峙关系，你是无法（或很难）通过理性辩论来说服对方的。因为你的价值跟我的价值不一样，谁的价值更应该得到追求？如果仅仅源于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在价值 A 和价值 B 之间是无法选择究竟是价值 A，还是价值 B。如果出现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值得我们追求？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恰恰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即我们可以在很多具体的语境里，把价值问题转化为事实和经验问题，从而可以推动我们对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探讨。

（作者系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雷少华：“未来已来”的学科融合时代

非常感谢章永乐老师邀请，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这次的感想。

20 多年前，我大学入学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在开学第一天，系主任说：“诸位同学，对于你们来说，今天学国际政治有可能有点早，因为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到有能力应用国际政治学科的时候。但是对该学科有兴趣的同学，要有这样一个信念，你们不要转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坚持学习，继续做下去，我相信再过 20 年，国际政治一定会成为国家非常需要的学科。”

在 1990 年代中期，国际政治专业大部分学生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学国际政治能够做什么？整个国际政治课程都是西方关系理论，例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一旦提现代国际关系时，我们被灌输的都是民族国家从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欧洲中心论成为现代国际关

① 强世功：《如何思考政法》，《开放时代》2023 年第 1 期。

② 强世功：《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开放时代》2022 年第 2 期。

③ 章永乐：《从“法律多元”到“世界帝国”》，未刊稿。

④ 强世功：《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开放时代》2022 年第 2 期。





系的基础。所以说，一代一代的学生被这样一种知识框架所约束。

前几年，学校有一个活动，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老师做了主题发言，给来自中国港澳地区的学者讲内地的改革开放。我被安排做该活动的主持，看了这个题目以后，自然而然地认为，由著名经济学家讲改革开放，一定是讲经济改革。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姚洋老师用了一个小时在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做总结的时候，我说：“当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政治学了，这将给我们这些学政治学的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

今天区域国别研究学科重新蓬勃发展，做国际关系的人自然而然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就是我们天然的学科领域，但是没想到法学院的老师现在也开始“侵入”我们的传统研究领域，所以才有了咱们这个“帝国、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研讨会。我更加感受到不同学科在不断“攻城略地”。过去是“不动声色地蚕食”，今天则是“明目张胆地鲸吞”。

法学院老师用了一个帝国和国际法的名义就扩张了他们的学术领地，对我们国际关系学科进行“蚕食鲸吞”。但是这也恰恰是一个新学科正在融合的过程。而在这样一个新的学科中，我们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老师将慢慢形成一个新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存在谁蚕食、鲸吞谁，而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这个融合过程包括了国际政治、法学、历史、新闻传播、历史及外语等相关学科。

所以，既有的不同学科在慢慢融合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知识体系不是将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进行简单的叠加和堆砌，而是把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各个学科，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科科学，融合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也就是形成“区域国别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主体性下，我们可能重新构建新的领域。虽然这个新的领域名字不变，但是内容却会发生巨大变化。很遗憾的是，往往许多新概念和新知识，政治家经常比学者更早更全面地提出。

例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这都是我国的政治家提出来的。因此，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学者需要在知识体系上加速构建新的话语和知识体系，也就是“知识权力构成”。虽然学者在知识权力内部，但学者间不断地争论是一种常态化。然而，知识权力边界扩张，不能仅仅由政治家推动，更需要由我国学者加速推动。

因此，回想 20 多年前老先生说过：“你们现在学国际政治太早了，30 年之后中国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你们将是 30 年后最主要的时代引领者。”因此，令人非常高兴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最后我想引用华为的一句广告词——“未来已来”。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对在座的资深学者、年轻的教师，还是更加年轻的学生，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要求我们自己慢慢形成一套理论、方法、研究路径，从而可能把一个貌似旧有的知识领域，逐渐拓展出来一个“具有中国立场，具有中国情怀”的新知识体系，希望在座诸位老师和同学追赶“未来已来”的时代大潮，共同努力，加速构建学术共同体，让我们珍惜它、爱护它、扩展它。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傅正：荆棘密布且紧要的区域国别研究

说起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我想起一件真实的事情：2017 年 11 月 14 日晚上，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在清华有场讲座，德克斯是南亚问题专家，十分了解美国区域研究的传统；他这场讲座的题目原为“学者与间谍”，意在揭露美国区域研究与其全球情报分析的关系。奇怪的是，出于各种原因，题目最终定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兴起”。为什么一个美国学者不可以在我国学术界直白地揭露其学术研究的政治背景呢？这很荒谬。

我想这件事情反映出一个尴尬的现象：我们不愿意或者不敢承认哲学社会科学背后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倒不一定表现为具体的政治图谋，它更多的是某种潜移默化的政治立场。我先从一个学术概念出发，谈谈这种政治性，然后谈谈我对区域国别研究和法意暑期学校的理解。

刚才好多朋友讲到“全球史”，全球史研究在今天很流行，为什么西方学术界在已经有了成熟的世界史研究的情况下，还会鼓吹全球史？我研究思想史出身，对于一个学术概念或学术流派的理解总会有些自己的“职业病”，往往喜欢考察这个概念或流派针对些什么。

全球史是针对传统世界史的，因为传统的世界史研究总是以国别史为中心，总是把国家政治作为历史叙事的主线。比方说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俄国史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史，它们共同构成了传统世界史研究的框架和主干。这种世界史研究传统起源于 19 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无疑，全球史研究针对过去的世界史研究框架。在当代西方学者看来，民族国家起源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为了反对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当代全球史研究会采用去民族国家化的叙事，会把叙事重心从国家政治变成非国家因素，比如文化、物产或者环境变迁。

所以我们会看到，全球史研究什么的都有，从白银、棉花、蔗糖到动植物的物种交换，甚至厕纸、马桶、内衣等。它们无一例外都处在国家政治的视野之外，都体现了破除民族国家叙事的诉求。显然，传统的世界史和当代的全球史都不是脱离政治的纯学术。没有 19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政治现实，就不会有传统的世界史框架。同理，没有欧洲二战以后的“去民族国家化”，就不会有全球史。两者都是西方政治现实的产物。

我并不怀疑西方学者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真诚态度，然而我却始终感到西方学者再怎么抱有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良好意愿，但他们始终无法真正摆脱西方的经验，也无法真正理解亚非拉人民目前需要什么。所谓的“破除西方中心论”，也就仅仅是自我感动而已。西方政治现实滋生出的学术范式，又怎么可能真正摆脱西方经验呢？

全球史的一个直接产物就是今天热议的“新清史”。比如欧立德（Mark Elliott）强调蒙古帝国的全球化，或者说蒙古帝国对于全球化的贡献，这意味着全球化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就存在了；欧洲资本主义不是全球化的因，而是全球化的果。显然，蒙古帝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欧立德等人据此鼓吹清帝国的蒙古性，甚至把清帝国等同于西方近代早期帝国，比如哈布斯堡王朝。我不怀疑欧立德等新清史专家在学术立场上的真诚性，然而我意识到，尽管过去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总被批评为“西方中心主义者”，但他们远比这些新清史专家更懂中国，更了解中国人民需要什么。

因此，我常常感到，仅仅依靠西方学者不可能完成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任务。他们流行的“白左政治正确”虽然迎合身处欧美的非裔或亚裔精英，却不适合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真正破除西方中心论，有赖于第三世界自身的思想崛起，包括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第三世界研究。我相





信，这既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大意义，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艰巨任务。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应讳言自己第三世界的政治立场。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新生的领域，也是一个荆棘密布的领域。大概在 2015 年的北京大学政治与法律年会期间，我们晚上吃招待餐，遇见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李晓宁老师。李老师研究情报出身，没那么多学术界的弯弯绕绕，他直白地向我们提起不久前参加的一场“一带一路”高规格学术会议，“结果会场上我问‘一带一路’经过哪些国家，竟没有人答得出来”。之后，他还挨个考我们“一带一路”国家的首都在哪里，弄得我们紧张得不得了。

这可能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了解第三世界的现状。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忧心忡忡——中国学术界自 1990 年代以来，总是把眼睛盯着美国和日本看，以至于在世界史研究当中，美国史和日本史占去了绝大部分，剩下那点也主要是 19 世纪以后的英国史，不要讲亚非拉史了，就连欧洲史研究都很贫乏，大片大片的空白等着填补。所以我当时很着急，遇到学术界懂法语的朋友就鼓动他们研究非洲史，不要再整天抱着福柯、德里达不放了。福柯、德里达当然很了不起，但他们需要那么多人扎堆研究吗？法国对非洲的殖民史研究难道不比福柯、德里达更重要吗？

我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太单纯了，不自觉地坑了别人。因为福柯研究、德里达研究在哪里都能找到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非洲史研究呢？没刊物。好不容易有个刊物吧，它还不是核心期刊，因为影响因子太低。

毫无疑问，今天荒唐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对于新生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说是很不友好的，这是区域国别研究荆棘密布的主要原因。以市场化的方式管理学术，以工科的方式管理人文社科，一定会造成“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少数用处已经不大的领域集中了绝大多数学术资源，而大片亟待开发的领域却罕有人问津。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表达对于亚非拉研究者的钦佩之情，在座的有许多同志研究非洲、研究俄罗斯中亚、研究南亚东南亚，感谢你们，在学术环境并不友好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从事有价值的研究，这很了不起。

强世功老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有一门研究生的课程，叫作“法学经典选读”。这门课程很有意思，虽然名为“法学经典选读”，却没有讲授狭义上的法学经典，反而讲授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乔治·凯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等非法学领域的战略学著作。以至于当时我参与他的课堂讨论时，总在担心学生的心态——学生们会不会抱怨“我辛辛苦苦考进北大法学系，就是想当名律师，这《战争论》《海权论》跟我当律师有啥关系”？

2019 年 7—8 月的某天，强老师跟我商量新学期的课程安排，他问我：“能不能在课上讨论中国传统思想，比如读一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王守仁的《传习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或《大同书》？”我当时忐忑不安，问强老师：“学生会不会有意见？会觉得这些不是他们想学的？”有意思的是，强老师回答：“法学难道不应该关注这些吗？法学不应该满足于搬弄法律条文，真正的法学应该关注正义及其可能的条件，这需要综合性的知识能力。我们不能把法学降格为讼学。”

我相信，区域国别研究的活力亦在于此，它不是以僵化的学术分科为导向，而是以复杂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你说我们研究某个对象国或对象区域，或者研究某个区域热点问题，它究竟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哲学宗教学的范畴，还是政治学法学的范畴？显然都不是，它超越狭隘的





学术分科本身。

北大法学院有打破狭隘学科藩篱的优良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也有打破狭隘学科藩篱的现实需求。法意暑期学校作为北大法学院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共同的结晶，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跨学科烙印。我相信这是法意暑期学校的重要特点或优势，使它判然有别于其他大多数暑期学校。

本期的法意暑期学校的主题是“帝国”，“帝国”研究超越某门具体学科。因此我们的学员涵盖了各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有人研究法学，有人研究国际关系，有人研究政治学，有人研究外语，有人研究历史，甚至还有人研究中文，各个方向都有。这是我喜欢法意的地方，因为我不想局限在某个学科内部。能在法意跟大家交流，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感谢法意，感谢大家，你们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冲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晓航：国际法史研究的批判性与保守性

“帝国与国际法”这一主题是始终贯穿各届法意暑期学校的主题之一。在座有不少来自国际法学专业的学员，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察觉到近 20 多年来西方国际法学界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便是西方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在暑期学校授课过程中，各位学员肯定听到不少关于批判国际法学以及批判国际法史的内容。在欧美国际法学界，一旦谈及批判国际法史的研究，基本上绕不开一个人，他便是芬兰的国际法学家马尔蒂·科斯肯涅米 (Martti Koskenniemi)。科斯肯涅米的研究和著述对国际法学术生态的影响和改造是巨大的，而且我认为在未来的很多年内，他的思想在国际法学界会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差不多两年前，我参加了他的新书发布会。有一位韩国的国际法学者问了在场嘉宾这样一个问题。他提问道，在欧洲的国际法学中有威斯特伐利亚传统 (Westphalian tradition)，他主张建构一个与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相匹配和平行的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法传统 (Eastphalian tradition)，并问在场嘉宾这一主张的可行性。在场众多嘉宾 (不少是批判国际法学的学者) 的回答很有意思，大部分观点认为既然现有国际法的知识体系已经足够完整并且自洽，为什么需要去改变它？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便批判国际法学对国际法的结构批判和话语批判是巨大的，但是当这一套国际法语辞体系面临来自外部 (比如东亚的) 学者的质疑的时候，它反而可能采取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和态度。

恰因如此，我们在看到批判国际法学批判性的同时，也需要理解它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呈现出的保守性。这与今天各位老师发言密切相关。包括刚才傅正老师所说，我们不能够低估西方学者在对自身学术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过程中体现出的善意，但是我们同时需要看到自我批判本身的保守性，以及可能展现出来的封闭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区域与国别研究和法意暑期班所代表的学术思潮是需要坚持和不断发展壮大。它能够凝聚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之间的共识，从长远看能够重塑国际法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

对于青年学者而言，法意暑期学校能给我们提供思考框架，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框架层面。知识框架需要血肉的支撑，问题意识可以很大，但是落脚点一定要小。法意暑期学校能给各位提供“脚手架”，但是知识大厦的“砖瓦”还是需要各位学员结合自身的专业领域和知识传





统，不断整合、不断突破。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宋念申：寻找一种新的普遍性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法意暑期班。我认为章永乐老师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找到不同学科比较前沿的学者，把他们的思想汇集在一起。我理解，这后面的目的或者说期待，是重新塑造我们和世界的知识关系。不论是法学界、政治学界、历史学界，还是国际关系等学科，现在确实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了。但最大的一个困境是，我们上学时候所习得的这一套逻辑、方法、概念和分析框架，已经越来越不适用。怎么办？我非常希望从别的学科、从更多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中吸取营养，滋养自己的学科。但是这样的平台不多。这是法意暑期班特别大的价值，它至少走出了第一步，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交流共同的想法。

我前天上课的时候，收到非常多的反馈，很多在我的学科圈子里面得不到，这种相互刺激非常好。后面一个老问题，就是未来我们的学科发展怎么办？这涉及刚才傅正老师讲的，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立场、方式，去重新审视我们和世界的知识关系？从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研究者的角度看，我觉得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不是旧有普遍性的反面或镜像，而是一个容纳各种各样不同文化因素和实践经验的杂糅的东西。这个里面边界感其实很模糊。比如说全球史的视角问题。我们当然都知道，全球史出发点是对过去以民族国家为叙述单位的历史叙事的反动，这没有错。但是，全球史也有另外一种倾向，它打破原有国族疆界之后，也可以指向国族重塑。所以全球史不是简单地反民族国家，它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操弄下，完全可以用来做相反的事情。我自己很希望全球史这个视野被带到中国历史研究里面，因为历史研究总是期待新鲜的刺激，当然这种刺激里面必然有我们选择性吸收的问题。

我在课上回答一位同学提到的怎么认知“新清史”的问题。我认为不需要一味排斥新清史的所有观点。如果我们同意，中国或中国古代王朝不能简单等同于汉人王朝，那么新清史的很多判断可以用来证明我们历史的多元面貌，不一定非得陷入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当然，过于极端的主张我们必须反对，并且可以用学术的方法批判和反驳。

仔细探讨中国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实践，我们很难用我们现有知识框架和知识边界去定义，因为中国在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而且不断展现多元可能性。这恰是今天特别重大的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如何重新理解普遍性。当我们提出新的普遍性原则时，是不是要用旧的普遍性思维塑造一个一元的单一的我，借助一个对立的镜像来理解自身？

我喜欢孙歌老师在《寻找亚洲》里提出的思辨。她指出：亚洲这个地域，其多元性就是其最重要的普遍性。^① 所以当重塑我们和世界知识关系的时候，首先要有开放和拥抱的姿态，在打开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可能性塑造得更为充实和圆满。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借助大家的智慧，我们一起从各个学科中汲取营养，重新思考我们的知识框架。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① 孙歌：《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强世功：追溯源流的“学术自觉”——从特殊主义转向普遍主义

今年是第四届“帝国与国际法”暑期班，组织这个暑期班就是针对目前高度学科化、专业化、建制化的研究趋势，希望围绕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跨学科、跨专业的讨论，推动学术创新和发展。特定的学科专业格局是特定的社会秩序的产物。人类秩序面临大变动的时代必然要回溯到人类秩序的根本性整全问题，对传统学科专业及其理论范式进行革新，由此产生新理论甚至新学科。目前的学科体系及其专业理论范式是欧洲崛起后围绕西方现代化秩序塑造而成的，中国崛起正在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然会推动理论范式的革新乃至学科体系的重建。为此，我们就需要回到类似帝国和文明这些关于人类秩序的根本性思考上来。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谈几点看法供参考。

其一，思考问题比单纯掌握理论更重要。大家来自各种不同学科和专业，都受到专业规训，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学科专业方法来思考代表专业水准的理论问题。这种思考都受到专业局限，预设了解答问题的各种理论和知识。然而，这些专业问题来源于一些本源性的重大问题，尤其是覆盖很多专业领域的整全性问题，而专业专科和专业理论往往是从一个侧面来回应这些根本问题的。从博士研究生训练开始，老师就希望大家在专业领域找到一个研究的小切口，甚至越专业越微观越扎实越精细越好，但老师肯定希望这个具体专业的研究要着眼于回答一个更大的理论问题。这就意味着，扎实的专业研究必须与宏大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

“学而不思则罔。”博士研究中扎实的专业训练是在培养学术研究的手艺，但回应什么样的问题、有怎样的理论和现实关怀，才体现我们的眼界、胸怀和境界。工匠和艺术家的区别不在于手艺，而在于视野和境界，这其实也是专家与学者、学者与思想家的区别。因此，思考问题才是做学术研究的关键。若丧失追问的能力，就会迷失到专业理论中，将自己熟悉的专业、理论和方法看作绝对真理，进而成为专业、理论和方法的囚徒。比如前些年流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一个例子，以“材料说话”为圭臬的实证史学也同样如此。

因此，我们从业余迈向专业的过程中，要警惕专业的教条主义，提醒自己“问题比专业理论更重要”，好的研究不仅在于提出好的问题，而且在于进一步推进对问题的理解。我们之所以推动这种跨专业对话，就是希望大家从不同的专业或理论角度回到帝国、文明这样一些人类秩序的根本问题上来，反思自己的学科专业理论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的，并在这种学科对话中推动理论创新。

其二，思考问题必须重视经典，甚至围绕经典问题展开。一旦进入问题的思考，那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几千年过去了，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时代里给出不同解答。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问题与古今中外的所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建立内在关联，由此形成了一个“思考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辨识其中的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经典不仅率先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设定了后来人们思考问题的方法，给出解答这些问题的基本范畴乃至理论体系。经典作家就是立法者，经典就是规范我们思考问题、展开学术研究的法典。正是围绕这种经典形成了文化传统乃至文明秩序。

因此，阅读经典是展开学术研究必备的学术熏陶，经典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参照，让我们理解自己的专业理论是从哪些经典中生发出来的，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我们理解和评判学术研究的法则和尺度，从而将根本问题与枝节性问题区分开来，把经典著作和参考文献区别开来。





大家在博士期间，往往将精力集中在阅读参考文献上，而忽略对经典著作的认真研读，尤其今天在座不少同学是历史专业的，大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挖掘档案和史料上，而忽略思考“历史对人生的利弊”。我们今天缺的不是档案史料或考古资料，而是面对材料提出问题的能力。如果说阅读参考文献、档案材料就像打拳模仿别人的招式，那么阅读经典著作其实就是站桩、扎马步，养自己的真功夫。我们阅读经典不是为对经典展开思想史的专业研究，而是培养我们理解世界、思考问题的能力。

其三，从事学术研究要有追溯理论传统的“学术自觉”。围绕经典以及经典提出的问题，我们就会形成一个研究传统。阅读经典著作就需要关注经典所塑造的研究传统。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有理论研究的学术自觉，明白自己的研究属于哪个理论传统脉络，有些经典著作往往是在理论传统中确立起来的。今天大家的研究往往直接对接西方当下的专业问题，在国外读博士更是如此。这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在专业领域中的接轨，但我们不应该一直追随西方当代学术往下走，而应当向上追溯并反思自己的研究传统，包括这些研究传统中经典作品设定的理论假设或研究方法。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追问自己研究的问题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是如何形成的，由此上溯“西学源流”就可以真正深入西学传统。就像刚才章永乐老师讲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既然取“经”，那首先就要辨识取回来的是不是西方文明中的“经”，以及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经”。然而，如何辨识经典，如何区分正典与负典、区分精华与糟粕，唯有对西方文明传统乃至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有深入思考才能培养出鉴别力。

西方经典进入中国必然会融入中国文明发展的源流中，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我特别希望大家要重视上一代、上上一代人的思考，自觉地接续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由此追溯五四一代的研究，进而越过五四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传统。今天大家无论英文能力，还是文献资料，都超越了上一代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在思考能力、思考深度上超过了上一代人。就像今天讲中国式现代化，大家才回过头来重视罗荣渠先生当年的思考。因此，建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无疑需要从建构中国学术传统入手。在这方面，社会学有非常自觉的研究传统，那就是接续费孝通先生的乡村和边疆研究传统。然而，我们还要重视其他一些传统。比起《江村经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似乎“更中国”，他关注社会变迁，但更关注社会变迁下中国人对个人命运、家族命运乃至国家命运的思考。之所以要重视《金翼》这样的经典，就在于社会变迁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对伦理秩序和生命意义的冲击，忽略这样的经典恰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阐明中国人生活背后的“道”和“理”。今天类似《江村经济》的研究多如牛毛，但类似《金翼》的研究很少。再比如当年潘光旦的研究，我们仅仅知道他关于生育、优生的论述，其大量论述被后人忽略。听说《潘光旦全集》最近正在编辑，但却找不到能够为其写序的学者。潘光旦先生对中国古典传统有深入研究并有大量著述，而这些研究在过去西方理论范式主导的漫长岁月中很少有人关注。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需要带着自己的眼光重新追溯自己的研究传统，自觉地激活研究传统中的经典。

我们今天缺的不是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学术论文，而是缺乏对人类文明根本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有中国古典文明的经典，有西方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经典，但更需要打通古今中西、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经典。中国文明复兴的标志就在于产生这样的伟大经典。唯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心智和视野才能写出经典。从这个角度看，我希望大家不仅有写作专





业论文的能力，而且有思考人类普遍问题、成为立法者的思想冲动和精神气质。

其四，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要从特殊主义走向普遍主义。追溯学术传统必然要面对五四以来的古今中西问题。中国传统的学术思考毫无疑问是普遍主义的，然而在五四以来的近代知识转型中，西方的普遍主义取代了中国的普遍主义，由此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出现“全盘西化”。古今中西问题变成了普遍与特殊的问题，西方的、现代的就是普遍的，而中国的、古代的则是特殊的、地方性的，无论右翼自由主义还是左翼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可以说，随着中国古典天下秩序的崩溃，中国古典的思想秩序、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也随之解体，由此全面引入西方的学术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然而，西方学术理论是从西方本土经验中生发出来的，用西方理论概念来描述中国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不可避免会形成“词”与“物”、“规范”与“事实”之间的错配，导致中国人丧失思考的主体性和生活的正当性，只能被动地回应西方理论提出的“为什么中国没有×××（比如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法治、人权、民主等）”的理论诘难。

在这种回应西方普遍主义的“启蒙敲诈”的过程中，中国学术思考要么采取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来自我否定并形成全盘西化立场，要么基于中国本土的主体立场形成一种本能的特殊主义叙事的自我防御，并由此形成“中国化”“中国特色”乃至“本土化”的叙事模式。这种强调中国本土特殊性的理论范式虽然可以借助后现代主义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叙事，但这种解构主义也必然会消解中国本土经验中包含的普遍道理。因此，当我们批评“美国例外论”的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例外论，其中最大的例外就是我们有五千年未间断的文明。这种例外论尤其体现在“王者不治化外之民”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如果我们继续秉持这个古典传统，那么未来无论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建构，还是面对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全球治理，都会受到这种特殊主义的羁绊。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其核心要义就在于面对全球化时代普遍主义叙事的挑战，有意识地推动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中国本土特殊主义的叙事转向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普遍主义叙事，从而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的人类迈向现代的普遍道理，并以此激活中国古典传统中的普遍主义。唯有在古今中外普遍主义叙事的对话中，才能探寻人类未来秩序的普遍之道。我们今天讨论的帝国、天下、文明这些主题实际上就是在探寻人类秩序的普遍之道。

探索普遍之道意味着人类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只是我们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给出不同的答案。西方现代性乃至后现代理论就是基于西方经验或过往人类经验给出的答案，那么，我们依然需要根据中国经验乃至当下人类的普遍经验给出新的解答。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强调“问题”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始终围绕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展开思考。比如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有：人类如何建立秩序？神与人的关系是什么？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是什么？强者和弱者的关系是什么？西方理论有系统的解答，中国古代经典也有系统的解答，那么我们今天能不能给出新的解答？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问题当成地方性的本土问题、家庭问题、人伦人情问题、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王道霸道问题等，这些看起来非常中国的问题，无疑是在回应人类秩序面临的普遍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讲出其中的道理，而且要追问为什么其他文化中给出不同于我们的回答。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在推动中国文明的复兴，这并非民族主义的，





帝国、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新视野

而是普遍主义的，是基于普遍主义的思考来奠定现代中国文明的文化根基的，能够为人类现代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当年的德国哲学非常了不起，面对英国和法国率先崛起产生的现代理论，德国的回应始终采取综合英法的普遍主义立场，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更高的普遍主义。

我们的暑期课程涉及帝国、领土、边疆和民族等问题，不少同学对讨论古今帝国兴衰充满政治热情，尤其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挨打、挨饿和挨骂的历史。我希望大家把这种政治激情转化成智识激情，对宇宙奥妙和历史法则充满热情，对世界上一切有意义的思考充满热情，对人世间各种事物充满热情，去学习、去思考、去研究。就像刚才章永乐老师讲的，唐僧取经所推崇的“唯识宗”未能成为中国佛教主流，但它在中国思想的版图中依然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纳入中国的知识版图和思想版图。在这个方面，近代西方崛起对整个世界的知识渴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尤其是早期的传教士、探险家和人类学家对于人类知识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唯有对知识充满热情，对智慧充满热情，才能涵养出良好的学术生态，才有可能在你们中培养出伟大的思想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现
场
Forum